

邹永贤主编

国家学说史

国家学说史

国家学说史

●下●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国家学说史

·下·

邹永贤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国家学说史

·下

邵永贤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3印张 4插页 312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90

书号: 3173·335 定价: 2.90元

目 录

第八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	(1)
第一节 托马斯·莫尔的国家学说·····	(3)
第二节 温斯坦莱的国家学说·····	(17)
第三节 巴贝夫的国家学说·····	(32)
第四节 圣西门的国家学说·····	(48)
简短小结·····	(74)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79)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国家观的 建立·····	(8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容·····	(101)
简短小结·····	(160)
第十章 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捍卫和 发展·····	(165)
第一节 列宁论国家问题的突出意义、国家问题的 实质·····	(167)
第二节 列宁论苏维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	(178)
第三节 列宁论苏维埃国家的管理和监督·····	(190)
第四节 列宁论国家的消亡·····	(211)
第五节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捍卫和发 展·····	(221)

简短小结·····	(266)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27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273)
第二节 毛泽东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的贡献·····	(295)
简短小结·····	(326)
结束语·····	(329)
附 录·····	(344)
I 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学说·····	(344)
II 拉斯基的国家学说·····	(373)
III 狄骥的国家学说·····	(388)
IV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学说·····	(404)
后记·····	(412)

第 八 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也有它的深刻的经济的、阶级的和思想的根源。虽然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就已有过对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不合理现象的批判，有过对公有制的、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社会的种种幻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先进的思想体系，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阶级对抗——早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出现而出现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出现，就孕育着它自身的内在矛盾。英国是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国家。在以圈地运动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阶级对立，即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城乡劳动人民和资本主义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第一部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好社会的著作，即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托邦》一书问世，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历经了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它的代表人物是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温斯坦莱、维纳斯等。十八世纪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它的代表人物是梅叶、马布里、摩莱里、巴贝夫等。十九世纪初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即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所有这些思想体系，都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里，代表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都是和无产阶级的前身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渴望相适应的。

每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是他们共同的时代特点。马克思曾概括地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①这些情况，决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不能不带有它的时代局限性。

列宁说：“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②。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抨击了旧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它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既不同于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国家学说，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2页。

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虽然各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学说，和他们的整个学说体系一样，带有各自的时代的、国家和民族的特点，从而表现出各自的色彩，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但都是适应各时期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是早期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的国家观。

每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国家问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思想资料，产生了影响。这里仅介绍四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学说。

第一节 托马斯·莫尔的国家学说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是十六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出身于伦敦的一个富有家庭，当过律师、下议院院长、大法官等职，曾经是英国政界的显赫人物。当他还是年轻的议员时，曾因皇室费用问题得罪英王亨利第七，被迫离开政界。亨利七世死后，莫尔重返政界并于1529年受命为大法官。英王亨利第八对莫尔的才华颇为赏识，但他的宠爱，并没有使莫尔陶醉。莫尔说过，若是用付出莫尔的头的代价可以取得法国的无足轻重的城堡，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牺牲掉的。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对于他，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困难和危局。^①1532年，莫尔由于反对英王的宗教政策等被迫辞职，继而被捕。1535年，亨利第八，这位曾拥抱着他的国王，终于以斩首来结束莫尔的一生。

莫尔所生活的年代，是不寻常的年代。一种新的剥削方式，

^① 莫尔，《乌托邦》第147页。

正在冲破封建制度的羁绊迅猛发展着。早在十四世纪末就消灭了农奴制的英国，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在欧洲（尤其是尼德兰）毛纺织业发展的刺激下，拉开了强力剥夺农民土地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的序幕。贵族、地主们竞相圈地饲养，结果使大片农田、村舍化为牧场，迫使几万户农民丧失了土地和一切生存资料。这种靠强力迫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就是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马克思说：

“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①。英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具有典型形式的国家。广大失地的农民到处流浪，被迫为乞为盗，而英国政府又以种种苛刑加以残酷迫害。圈地运动乃是一场怵目惊心的社会瘟疫，莫尔形象地把当时的英国社会称为“羊吃人”的社会。他目睹圈地运动给广大劳动者带来的灾难，目睹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夺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径。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对封建的以及初生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进行有力的批判，表达了原始积累时期正在形成的无产者对普遍改造社会的要求和对没有剥削、压迫的生活的向往，提出了彻底废除私有制度，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的方案。《乌托邦》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国家学说，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私有制、阶级对立和国家的实质

托马斯·莫尔揭示了在私有制度下，整个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部分的事实。尤其是还在资本主义关系初生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2页。

时候，他就敏锐地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对抗在萌发起来。莫尔还没有科学的阶级概念，在他那里，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阶级对立，是以“富人”和“穷人”相互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富人”，指的是贵族、银行家、高利贷者、地主豪绅等新老剥削者；所谓“穷人”，指的是“种田的、挖煤的、做零活的、赶货车的、或干苦工的”等城乡劳动人民。莫尔认为前一种人是“凶狠的、邪恶的、毫无用处的”；后一种人是“质朴真挚，劳动终日，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自己所得到的好处”。^①他深深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尤其是圈地运动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他狠狠地鞭笞各种剥削者，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新强盗。莫尔关于“富人”和“穷人”对立的观念，既包括封建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也包含了早期的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他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揭示了这种对立。莫尔特别关注的是初生的资本主义剥削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把批判的锋芒着重指向资本主义新强盗。这样，他关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论述，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特点。

“一面穷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②，这是莫尔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日益严重的贫富对立的形象的概括。他指出：一方面，劳动人民终日胼手胝足，牛马不如。可是，繁重的劳动折磨完他们的青壮年时期，最后以老病交加，穷困潦倒而了却一生。另一方面，贵族、银行家、高利贷者等，一事不做却穷奢极侈。他们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重重剥削”，不但挥金如土，还养活一帮专吃闲饭的侍卫。特别是，还有一帮“贪狠的国蠹”，即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已经不满足于祖传地租上的年租岁金，

①② 莫尔：《乌托邦》第55—56、38页。

他们囊括好几千英亩土地，赶走农民，毁了田园、房屋和城镇，只留下教堂当做羊圈。少数人为发财致富，用诡计和暴力剥夺农村劳动者的一切，使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毫无生计，他们就只有行乞而受监禁，或者盗窃而上绞架。莫尔用辛辣的讽刺，形象地刻画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瘟疫：“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①。

严重的贫富对立，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羊吃人”的实质，是人吃人。莫尔在揭露“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的同时，揭示了他们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他着重从国王和群臣、常备军和法律等方面，对代表少数富人利益的封建专制国家进行了鞭笞。

十六世纪，英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已经达到它的极点。莫尔批判的锋芒，首先就指向专制的国王和群臣，从而揭开这个表面上代表全社会的国家的面貌。他抹掉国王身上的灵光，揭露国王的贪婪和野心，指出：国王的会议，不是策划战争的各种阴谋诡计，就是策划各种加强剥削的方法。国王们并不满足于自己的王国，总想夺取新的王国；他们宁要战争而不要和平。平民作战并非自愿，他们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断肢折臂，转死沟壑；一切穷兵黩武都使得许多国家为君主个人的原故而扰攘不安。“老百姓选出一个国王，不是为了国王，乃是为他们自己”^②。但是，国王全然不顾臣民利益，一味贪财图利。而一帮阿谀奉承的谋臣，尽力迎合国王的心意，策谋各种以剥削人民为目的的决议，或者把国王的特权置于一切法律之上，还寻找各种论据去掩饰这种行径。他们要人民相信，无论国王怎样堆金如山，也不为多；即使国王

^{①②} 莫尔：《乌托邦》第36、50页。

想做错事，也决不会把事情做错；一切都属于国王，连老百姓也属于国王，每个人的全部财产只是国王出于恩慈而不忍取去的那部分。总之，他们认为国王权力的主要保障是不让老百姓富强和自由。因为贫困才能挫败老百姓的锐气，使他们在苛政之下俯首听命，天下方可安宁。莫尔指出：贫困恰恰是不安宁的根源，不满现实的人更愿意天下大变。国王的所为，要是让一个人快活享乐，而其余的人呻吟哀号，那么他就“不是做南面王，倒成了监狱官”^①。假使一个国王被百姓如此地轻视憎恨，以至于他只有用侮辱欺凌、巧取豪夺、充公没收以及搞穷搞光等一套办法去胁迫他们服从，那么，与其如此，还不如退出王位。^②

莫尔进而批判了君主制下的常备军，提出了“兵匪一家”的观点。他指出：只要常备军存在，盗匪就一定不会绝迹。“一方面，做匪的并非是极其干练的兵，另一方面，当兵的也并非最卑怯的匪人。兵和匪二者彼此极其相象竟是到了这般的程度”。^③几乎一切国家都养活难以数计的常备军，他们祸国殃民，不但毁灭了他们自己的帝国，甚至毁灭了自己的土地城市。养活这类“畜性般的东西”，对国家有害而无益。

身为律师、议员的莫尔，从社会上严重的贫富对立，特别是从圈地运动期间国家血腥立法，看到了法律的阶级性。他说：“富人假借国家名义，就是说，包括了穷人的名义在内，把他们的阴谋规定成大家必须遵守的东西，这种阴谋就当成了法律”^④。富人天天在用私下的欺骗手段和假借国家的法律驱使穷人象驮载的牲畜一样为他们劳动，而且还要侵蚀穷人的微薄收入；社会上的种种不公道的行为，富人们都可以通过玩弄手腕，利用颁布法律曲解成为公道。莫尔坚定地站在遭受圈地运动迫害的劳动者一

①② 莫尔：《乌托邦》第51页。

③④ 莫尔：《乌托邦》第35、125页。

边，声斥用残酷的刑法对付流离失所的人是“极端不公道的”。

莫尔从经济上、政治上揭示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对立，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对立的根源，那就是私有制的统治。马克思曾说过：托马斯·莫尔是“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家之一。^①虽然莫尔还未能科学地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也未能科学地揭示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试图从经济关系中考察社会的阶级对立以及国家在阶级对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明确地认为：“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那就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财富，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被他们分掉，其余的人就变成穷困不堪。”^②既然私有制把人们分裂为经济利益完全对立的部门，那就不可能有代表全体利益的国家。莫尔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私有制度下，国家丝毫不保护穷人的利益，而是维护统治者、剥削者的利益。他写道：“当我不止一次地把现今一切昌盛的国家仔细地观察考虑一番，我可以发誓肯定地说，我所见到的似乎只是一伙富有者狼狈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私人利益打算。他们想出种种方法诡计，首先把自己已经骗得的东西保存巩固起来，其次是用极低廉的工价去奴役穷苦的人们替他们干活出力，如同驮载的牲畜一般。”^③莫尔愤愤不平地指出，达官显贵和一般富人终日一事不做，竟从国家那里得到厚惠，而国家一天也缺少不了的劳动者牛马一生却得不到国家的丝毫关怀。他问道：“你能说这个国家有公平，有恩义么？”固然莫尔批判的锋芒是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国家，但是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他所否定的乃是包括封建专制在内的一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正是由于从所有制的高度去考察国家的实质，因而莫尔得出这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7页。

②③ 莫尔：《乌托邦》第55、125页。

的结论：“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①。在私有制的国家里，“每个人都知道，不管国家怎样繁荣，如果他 not 为自己着想，他还会饿死的”^②；那些口头上谈说“公共福利”的统治者，尽是为私人的利益奔走打算，他们的利益总是要放在别人的利益之上。莫尔断言：在私有制的国家里，“如果我会找到一点公平正义的痕迹，我就该死”^③。

如上所述，托马斯·莫尔已经看到了私有制度下必然存在的阶级对立；看到了私有制下，国家只是维护少数富有者的利益，奴役劳动人民的国家的问题。这样，莫尔虽然模糊地然而却是天才地猜到了国家的阶级实质。

铲除祸根，才能消灭祸害。莫尔已经多少意识到，一定的国家制度不是可以离开一定的所有制而独立存在的。正因为这样，他决不把希望寄托于单纯的国家制度的改革。他写道：“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末，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④。他坚定地认为，除非彻底铲除私有制，否则任何改革都只是一种治标的方法。诸如规定财产限额、禁止国王大权独揽、制止官职买卖等等，固然可以使社会祸害减轻些、缓和些，但是这样做只能是“一病方除，一病复发”，想把它根除是绝不可能的事。

如果说，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及维护少数富有者的国家，才能根绝一切社会祸害，那么，唯有完全实行公有制和民主制度，才能消灭剥削、压迫，做到人人平等、富足。这是托马斯·

①②③④ 莫尔：《乌托邦》第55、123、123—124、56页。

莫尔的国家学说的基本点。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提出了未来社会国家制度的种种设想。

二、关于未来社会国家制度的设想

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根本制度是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公有制。在这种制度下，“一切归全民享有，……虽然每个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①；由于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一切寄生虫以及欺骗、偷盗、暴动、毒害等等罪行。

从古代社会到中世纪，都不乏批判私有制和赞颂公有制的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不仅在于他把生产资料的公有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并且对消费也提出了具有公共性质（如公共食堂等）的设想，而更重要的是，他所主张的公有制是和统一的计划经济、消灭家庭、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国家职能简化等一系列思想紧密联系一起的——虽然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模糊的倾向。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莫尔第一次描绘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制度的蓝图，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设想，对后来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乌托邦”社会实行民主的选举制度。“乌托邦”岛共五十四个城市，每个城市分为四个区。每三十户选出一名基层行政长官，叫“飞拉哈”；每十名“飞拉哈”选出一名高级行政长官，叫“首席飞拉哈”。城市的最高权力属于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元老院是常设机关，它由城市每个区的人民推荐一人组成；全体“飞拉哈”从元老院成员中选出一个“王爷”作为全城最高首领。国家近似城市联盟，为方便议事，首府设在岛的中心处。国

^① 莫尔：《乌托邦》第123页。

家最高权力属于元老院和全岛民众大会。元老院每年由各城市选出三人组成，它是常设的全国权力机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由选举产生。“王爷”是终身职务，但若有虐待人民的嫌疑，就被撤换；“首席飞拉哈”虽然一年一选，但非有事故，并不更换；其他行政官员一概每年一选。莫尔写道：在乌托邦，想用阴谋诡计去取得官爵的人，绝无希望得到。此外，他还有一个在当时颇带异教色彩的设想，即乌托邦社会为数不多，只有荣誉而无实权的教士，也由选举产生，妇女可以当选。

莫尔所设想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对一切专制的否定，它对后来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应当指出，莫尔的设想仍有一些缺陷，那就是，王爷的终身制和首席飞拉哈的并非严格的按期更选。所谓“非有事故，并不更换”，实际上意味着首席飞拉哈可以是一种无任期的或者终身的职务。乌托邦社会实际上是实行民主选举基础上的终身制、长任制和常年更换制相结合的制度。这几种制度，在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都各有所取，而在温斯坦莱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民主选举制度得到更加彻底的贯彻。

乌托邦社会，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实行严格的民主管理制度。在那里，一切公共事务都要经过充分的讨论。首席飞拉哈要经常邀请两名飞拉哈到王爷处议事。但除了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外，所有行政长官都不能对公众事务作出任何决定，否则以死论罪。之所以如此严厉，是为了使王爷和首席飞拉哈“不易阴谋变更国章，肆虐人民”^①。此外，遇有重大事件，均需通知各户，讨论后交元老院决定；有时还得由全岛大会讨论。耐人寻味的是，在莫尔对乌托邦社会民主管理制度的颇为详尽的描绘中，关于“国家元首”的职务只是一笔带过。除了提到“国家元首”应当是

^① 莫尔：《乌托邦》第65页。

“有学问的人”以外，职权方面没有更多的叙述。由于乌托邦社会并没有赋予“国家元首”以任何特殊的权力，这就更加突出了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如上所述，我们从乌托邦的民主管理制度中，可以隐约看到集体领导的制度以及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原则。此外，莫尔强调乌托邦的所有行政长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一般民众完全平等。他们除了为民办事外，毫无特权。虽然他们出于工作需要，依法可以免于做工，但实际上总是争取做工，以便以身作则去带动别人。在乌托邦社会，官民和睦相处，亲如父子。“王爷”与众不同之处，不是他头戴王冠，身穿王服，手执权杖，而是“带着一束穗状花”，所有的长官，都不会令人生畏，他们的行为，赢得了人民并非出于被迫的“当然的尊敬”。这些，无疑是对当时欧洲社会中那些一事不作、挥霍无度、敲榨勒索的老爷们的一种鞭笞。乌托邦社会之所以能够实行民主管理制度，能够实行官民平等，乃是由于他们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

乌托邦人的法律，是在不受暴政压制和阴谋操纵情况下制定的，它旨在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照顾个人的利益而不至违反这些法律，这才是明达的行为。同时也要以公共的利益为前提，这便是你的义务”^①。乌托邦人就在这种互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法律。“法律很少”，这是乌托邦制度的一大特色。莫尔认为，在公有制下，人们的利益一致，同时，私人间的纠葛也很少见，因而有了简单的法律已经够用了。至于私有制的国家，法律繁多，有无数卷的律例和注释，仍然无济于事。繁多琐碎的法律，只有利于挑唆是非、曲解法律的律师和蓄意诬蔑的老奸巨猾，它对老百姓不过是一种愚弄和专横的约束。莫尔提出，“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越公正的法律。”^②他认为，一切

^{①②} 莫尔：《乌托邦》第84、100页。